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臺灣社會學刊》第71期  
2022年6月，頁xx-xx 【研究紀要】  
10.6786/TJS.202206\_(71).0003

## 探索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

汪宏倫

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MOST 110-2410-H-001-067）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助理林政與郭政良協助蒐集與分析資料。筆者在寫作修訂期間，得益於與林宗弘、陳志柔、鄭雁馨等人的討論，投稿過程中三位審查人的意見、學刊編委會與主編陳美華提供諸多建議與協助，在此一併申謝。因受限篇幅，原稿部分腳註與參考文獻不得不忍痛刪除。如需完整版本，請逕洽作者。

※收稿日期：2021.10.15 接受刊登：2022.07.18

---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115201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Email：[hlwang@sinica.edu.tw](mailto:hlwang@sinica.edu.tw)

## 摘要

2018年，蔡英文政府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專責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而促轉會在歷經兩次延任之後，也已經在2022年5月落幕收場。從表面上看，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上面似乎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也累積了相當多研究文獻，然而有關轉型正義的實證研究，迄今仍相當稀少。我們並不知道：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一般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究竟理解多少？是否支持？而什麼樣的因素，影響著人們對轉型正義的態度與看法？本研究利用2020年中研院社會所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資料，針對一般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的態度與看法（包含理解、支持、評價、特定議題與參與意願等問題）進行實證研究，透過量化分析來描繪出轉型正義社會基礎的初步輪廓。結果發現，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是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態度與看法的兩個最主要因素，性別與世代次之，但世代的影響方向，卻與一般常識性的理解相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族群身份在轉型正義的相關問題上完全不具任何顯著影響。換言之，不同族群之間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過去認為轉型正義會挑起族群對立的說法，並未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此外，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我們也不免憂慮，在台灣當前藍綠惡鬥、以及國族認同處於分裂的狀態之下，以目前的方式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會不會讓台灣社會內部更加對立、距離和解的目標越來越遠？這是值得深思、也需要實證檢驗的問題。

**關鍵詞：**轉型期世代、轉型後世代、政黨傾向、國族認同、共識

## Exploring the Social Bas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Horng-Luen W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Recently, transitional justice has become a hot academic and political issue in Taiwan. Despite the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however, there has been scarce, if any,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As a resul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social bas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much does the general public know about transitional justice? Do people support transitional justice?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ransitional justice?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2020 Social Image Surve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ocial bas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by empirically investigating the attitudes and views of the general public. We find that party incli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re the two primar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ransitional justice. Next to them are gender and generation, but the direction of generation's impact is opposite to that expected by conventional wisdom. What is noteworthy, above all, is that ethnic background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at all on issues related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sees transitional justice may stimulate ethnic antagonism is not supported by our empirical analysis.

**Keywords:** transitional generation, post-transition generation, party incli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onsensus

## 一、導言

2021年9月，進入第二次延長任期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公布了「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內容包含「一個構想主軸、二大轉型方向與三大處置措施」。具體地說，促轉會將以「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將園區轉變為歷史教育素材，除了改造威權空間之外，也要重構紀念敘事。而針對園區內主要威權象徵，則將採取三大處置措施，包括移除大廳內的蔣介石銅像、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以及破除目前存在於園區內的整體崇拜軸線。消息一出，立刻引來正反兩面的輿論意見。支持者肯定促轉會的規劃構想，認為民主時代不應該再紀念一位威權統治時期的獨裁者，否則將阻礙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另一方面，反對者則再度批評這樣的規劃方案僅是民進黨政府的一種政治操作，將會挑起更多仇恨與對立，無法達成社會和解的目標。<sup>1</sup>事實上，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僅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應該藉由這樣的爭議進一步思考：究竟轉型正義與台灣社會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台灣社會又是如何看待轉型正義的？

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先後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開始積極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其中飽受爭議的促轉會在歷經兩次延任之後，也已經在2022年5月結束任務。從表面上看，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上似乎已取得階段性的成果，然而，如果退一步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潛藏在背後卻很少人探討的問題。首先，轉型正義是一件大規模的社會與政治重建工程，最好能夠凝聚足夠的共識，否則不易推動，甚至可能造成更多更大的分裂<sup>2</sup>。反過來說，轉型正義本身也是一個重建共識的過程，因為需

---

<sup>1</sup> 參見自由時報（2021a, b）。

<sup>2</sup> 一位審查人認為，本文預設「轉型正義需要先凝聚共識才能成功推動」是有問題的，筆者回應如下。第一，「轉型正義必須要凝聚共識才能推動」，這件事在學界或實務界並沒有共識，但是學界的研究的確指出，在尚未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推動轉型正義（如利比亞），有可能導致混亂與失敗（Hamad 2020）。事實上，單單就「轉型正義是什麼、內容包含哪些、應該如何推動」這件事情，學界本身也缺乏共識（Maršavelski and Braithwaite 2020: 210）。有些學者不認為「和解」是轉型正義的核心概念，而對於什麼是和解、如何達成，也缺乏明確的共識（周婉窈 2019: 10；Kostovicova and Bicquelet 2018: 682；Aiken 2013: 5）。第二，放在台灣的脈絡來看，曾有倡議者認為，轉型正義的價值必須建立共識，台灣便是因為沒有形成共識才會缺乏進展（徐永明2008a: 2）；近來也有學者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面臨更多爭議性議題，必須要有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共識，才能強化建立在正義與和解之上的民主（Chang-Liao and Chen 2019: 642）。因此，筆者的看法並非特例。第三，轉型正義是否需要凝聚共識才能夠推動，這是一個規範性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判斷的問題。關於這個規範性的問題，並不是不能進行學術討論，但必須另文處理（相關討論可參見汪宏倫 2021）。本研究的首要定位是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旨在探討「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而不是去論證「轉型正義需要先凝聚共識才能成功推動」。本文在結論部分，將會針對「共識」問題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要推動轉型正義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曾經面臨嚴重衝突、高度分裂的社會，而轉型正義所要做的，正是要弭平裂痕重建共識 (Rigby 2001; Aiken 2013)。前文既說「轉型正義最好能凝聚足夠的共識」，此處又說「轉型正義所要做的是重建共識」，似乎有點混淆了「轉型正義」與「共識」兩者之間的前後順序與因果關係，甚至顯得自相矛盾。其實不然。「轉型正義需要凝聚足夠的共識」，指的是「對於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情有相當的共識」，而轉型正義所要建立的共識，則是對於「如何面對未來、如何處理過去」這件事情取得共識<sup>3</sup>。這兩種共識，其實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想知道的是：台灣社會對於「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是否已經具有足夠的共識？人們是否認為，政府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的確有助於達成和解、重建「如何面對未來、如何處理過去」的共識？這牽涉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社會大眾如何理解與看待轉型正義。和「自由」、「民主」、「人權」等一般民眾琅琅上口的概念或實作不同，「轉型正義」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詞彙，它被西方學界創造出來不超過短短20餘年的時間，被引介進入台灣也不超過20年 (汪宏倫 2021)。當政府大張旗鼓地設置專責委員會來推動轉型正義時，我們想知道的是：一般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這個新概念，究竟有多少理解？他們如何看待「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多少民意支持轉型正義？什麼樣的人支持、什麼樣的人反對？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的理解與看法？儘管國內學界對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已經累積了不少學術與非學術的討論與研究，相關文獻也堪稱豐富，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關於轉型正義的相關實證研究。換句話說，我們並不清楚：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究竟哪些人支持轉型正義、哪些人反對？什麼樣的因素（族群、性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政黨傾向、國族認同等）會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的看法？回答上述問題，正是本篇研究紀要所要彌補的研究空缺，也可說是本研究的原創貢獻之一。<sup>4</sup>

這樣的探問並非瑣碎，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上的意涵。在現實意涵方面，舉例來說，「清除威權象徵」是許多轉型正義支持者的倡議，也是《促轉條例》明文規定促轉會必須推動的工作之一。然而，究竟什麼才算是「威權象徵」、社會大眾對於「清除威權象徵」這件事情是否具有足夠共識，都是值

---

<sup>3</sup> 關於轉型正義所牽涉的是「如何面對未來、如何處理過去」的論證，參見汪宏倫 (2021)。這個論證主要是根據Teitel (2000) 從現象學所提出的建構主義觀點，而這種建構主義式的分析，在過去台灣有關轉型正義的討論中，是相當欠缺的。

<sup>4</sup> 台灣內部對於轉型正義的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對規範性議題的論辯（應該或如何推動轉型正義，如吳乃德 2006；江宜樺 2007；廖元豪 2017）、對具體議題（二二八、白色恐怖、黨產問題）的探討（如張炎憲、陳美蓉 2009；徐永明 2008b）、或是對轉型正義的整體性評介或回顧（例如真促會 2015；葉浩 2017；李怡俐 2016；周婉窈 2019），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關於轉型正義的實證調查研究。

得進一步檢驗的實證問題。在理論意涵方面，究竟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哪些因素影響著人們對轉型正義的評價與態度，這些都是促進我們完備轉型正義的基本知識、建構相關理論的重要基礎，如此才能釐清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解之間的關聯機制與可能性。本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填補這些理論與現實意涵上的研究空缺。

## 二、研究問題：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與影響因素

要了解一般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的態度與看法，我們可以從（1）理解、（2）支持、（3）評價、（4）對特定議題的處理方式、以及（5）參與意願等幾個面向來加以探究。具體來說，我們想要探究的問題包括下面幾項：

第一，社會大眾是否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的理解？

第二，社會大眾是否支持政府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的支持？

第三，社會大眾如何評估轉型正義工作的成效？具體來說，轉型正義是否達到其所宣稱的「促進社會和解」的目的？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的評估？

第四，轉型正義所牽涉到的議題相當繁複多樣，與一般社會大眾的距離也有不同。我們想要理解人們對某些具重大爭議的特定議題（例如本文一開始所舉的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有什麼樣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又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根據《促轉條例》第2條規定，促轉會所要規劃、推動的工作事項共有五項，其中第一項與第二項分別為「開放政治檔案」與「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我們從裡面挑選了兩種類型的工作為例——即：開放政治監控檔案、以及移除蔣公銅像——來理解一般社會大眾是否贊成這樣的處置方式<sup>5</sup>。這兩項工作牽涉到的具體內容相當不同，代表了兩種迥異的典型。移除蔣公銅像所牽涉到的是某一個具體特定的歷史人物，而且蔣公銅像（或相關的紀念場所

---

<sup>5</sup> 參見《促轉條例》第3條與第5條之規定。

與命名象徵) 在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具有高度的可見性與象徵意涵。相對地，政治監控檔案並不存在日常生活中，不具有高度的可見性，象徵意涵也不如銅像那麼清晰明確，但是政治監控檔案可能牽涉到為數眾多的具體個人，其中包含了威權體制的加害者、協力者，也包括了遭到監控的受害者。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工作，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而造成分歧看法的主要因素又是哪些，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第五，轉型正義基本上並不是一個與社會中每一位成員都直接相關的事務，但是卻又需要凝聚相當的共識。我們想要理解：如果有管道可以發表意見影響轉型正義的做法或政策（例如透過公民審議會會議），一般社會大眾的參與意願如何？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參與的意願？

在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及可能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文獻的討論、以及對轉型正義所涉爭議的觀察，歸納出性別、世代、族群身份、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等因素，作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要自變項。各個變項的相關性分述如下：

#### (1) 性別

性別在轉型正義中是一個重要但卻經常被忽略的變項。轉型正義所處理的是大規模暴力或人權迫害之後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在過去轉型正義的討論中，女性大多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現（例如性暴力的直接受害者）。然而，女性在加害／被害過程背後所涉及的社會政治體系中複雜多樣的角色，往往被忽略。更重要的是，由於性別在傳統的轉型正義討論中經常被邊緣化，因此女性的聲音與觀點經常遭到忽略。放在台灣的脈絡來看，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受難者，以男性居多，而女性多半是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出現，但她們的受害經驗與主體身份卻往往被忽視，直到近年才逐漸得到關注（葉虹靈 2016；許雪姬等 2014）。國外的研究也指出，過去對轉型正義的討論過分以男性為中心，女性對於公平、正義等規範性問題上，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亟需將性別的觀點帶入轉型正義的討論中（Buckley-Zistel and Stanley 2012: 5-20）。因此，性別是一個影響轉型正義態度與看法的一個重要變項。

#### (2) 世代

世代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轉型與社會變遷中經常扮演重要角色，台灣也不例外。不同的世代，不僅在國族認同上有所差異，在政治態度與價值取向上也有

明顯不同 (Rigger 2006; 林宗弘 2015, 2017)。在轉型正義上,也可以觀察到世代差異的趨向 (葉浩 2017: 35)。為了便於分析,本研究參考一般的界定方式,並根據本研究所關心的轉型正義問題,將受訪者區分成戰前、戰後嬰兒潮、轉型期與轉型後四個世代:

- ① 戰前世代:指的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世代;
- ② 戰後嬰兒潮世代:指的是戰後二十年間(1946-1965)出生的世代;
- ③ 轉型期世代:指的是1966-1987(台灣解除戒嚴之年)間出生的世代<sup>6</sup>;
- ④ 轉型後世代:指的是1988年以後出生的世代。

由於出生年代的差異,不同世代所經歷的成長時空與歷史事件十分不同,對特定歷史事件的感受與記憶也會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極有可能反映在他們對轉型正義的態度與看法上。具體來說,戰前世代曾經歷過二次大戰(對本省人來說還包括殖民地經驗,對外省人來說則包含了對日抗戰)、國共內戰與白色恐怖,戰後嬰兒潮世代則是在戰亂或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出生成長,威權統治對於這兩個世代所產生的影響可說特別強烈。轉型期世代出生時,台灣社會已經逐漸脫離白色恐怖的肅殺氛圍,而他們的成長過程,則是歷經了台灣1980年代的民主化,其中有不少也是1980至19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可以說親身見證了政治轉型的過程。轉型後世代,則是出生在一個解嚴之後相對富裕安定的社會中,台灣政治基本上已經逐步民主化,威權統治對他們來說只是歷史,並不存在他們親身活過的生命經驗當中。他們對威權統治的認識與理解,基本上來自教科書、大眾媒體或是家族親友所傳遞的集體記憶。更重要的是,轉型後世代在進入學校時,他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已經開始產生變革,整體的課程設計從「以中國為中心」逐步走向「以台灣為中心」,因此他們對威權統治時期的理解與評價,和前面三個世代相較,除了缺乏個人生命的直接體驗外,觀點也可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sup>7</sup>。

### (3) 族群身份

---

<sup>6</sup> 《促轉條例》所界定的威權統治時期是到1992年11月6日金馬地區解除戒嚴與戰地政務才算結束,但台灣地區的戒嚴令在1987年7月15日便已解除。

<sup>7</sup> 台灣的課程變遷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教育體制與課程內容一步一步從「以中國為中心」走向「以台灣為中心」。參見王甫昌(2001)。



台灣戰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省籍」或「族群」一直是個重要因素，也是轉型正義經常觸及的議題<sup>8</sup>。在轉型正義的討論中，二二八事件是最早被提出來的議題，而二二八事件又經常被放在「族群衝突」的脈絡下理解（吳乃德 2008）；職是之故，族群經常被認為是轉型正義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早期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大多環繞著二二八事件，常讓批評者認為這是刻意挑起族群矛盾（陳宜中 2007），而深受黨國意識形態影響的媒體則一再複製國民黨的官方說法，認為「重提二二八就是撕裂族群傷口、製造族群衝突」（陳翠蓮 2008：205）；另一方面，轉型正義的倡議者也認為，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歷史記憶，是造成轉型正義在台灣無法落實開展的原因之一（吳乃德 2006）。晚近的轉型正義納入了不少對於白色恐怖的探討，使得外省族群的受害經驗也逐漸受到重視，如果再加上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問題，將使得轉型正義與族群身份之間的關係顯得更加複雜<sup>9</sup>。族群身份對轉型正義究竟造成何種影響，的確是個值得檢驗的課題。

#### （4）政黨傾向

在台灣轉型正義的相關爭議中，反對者最常提出來的批評，便是民進黨及其支持者以轉型正義之名、行政治鬥爭之實，其中最知名的事例，便是發生在2018年選舉期間的「東廠事件」。台灣的轉型正義與政黨惡鬥緊密相關，其實並不難理解，而且其來有自。根據《促轉條例》的界定，「威權統治時期」指的是「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這段期間完全由國民黨執政，因此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事務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也就是針對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這種強烈的針對性，一方面引發反對者的批評，一方面也使得轉型正義無法與藍綠兩黨之間的政黨政治完全脫鉤（廖元豪 2017；江宜樺 2007；陳芳明 2007）。我們可以推斷，不同的政黨支持者對於轉型正義，也會有相當不一樣的看法。

#### （5）國族認同

當前台灣社會中存在的一個根本而重大的分歧，在於分裂的國族認同（江宜樺 2001；林佳龍 2001）。抱持「台灣人認同」的人，傾向於以「台灣中心

---

<sup>8</sup> 台灣當前盛行「四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說法，其實是在1980年代後期，隨著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才逐漸形成，可以說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但在此之前，不同群體之間的區分或矛盾已經存在社會之中（例如「省籍」），只是「族群意識」（背後經常隱含著對抗意識）沒有被動員起來。參見張茂桂（1993），王甫昌（2003）。

<sup>9</sup> 有關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探討，可參見張炎憲、陳美蓉（2009），林傳凱（2015）；當事人的觀點，可參見吳俊宏（2020）。有關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問題，則可參見吳豪人（2019）。

史觀」來看待歷史、評價過去事物，而懷抱「中國人認同」的人，則傾向於從「中國中心史觀」來解讀歷史、評價過去。台灣人認同者與中國人認同者，對於台灣的國族定位與未來走向，看法也是南轅北轍。由於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過去」以及「如何面對未來」（汪宏倫 2021），而懷抱不同國族認同的人們之間，對於過去的詮釋與未來的展望，可能有極大不同，因此他們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也可能存在重大差異。

### 三、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2020年下半年進行的「社會意向調查」。本次調查以年滿18歲以上、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為調查母體，採分層多階段RDD-PPS隨機暨戶中抽樣法（Random Digit Dialing Using 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within Household Sampling），於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15日對台灣地區民眾進行電話訪談，一共完成1218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從「理解」、「支持」、「評價」、「對特定議題的處理方式」以及「參與意願」等五個面向來探討社會大眾對於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態度。在2020年的社會意向調查中，共有七個問卷題目對應到這五個面向，其中「評價」包含了兩題：「一般性評價」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轉型正義對社會和解有幫助，「政治性評價」則是詢問轉型正義是否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的政黨鬥爭。此外，「對特定議題的處理方式」也包含了兩題，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移除蔣公銅像」與「開放政治監控檔案」的看法。這七道題目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依變項，其回答均以二元變項處理來進行後續分析。各面向所對應的問卷題目、選項與二元變項處理方式，彙整於表1。

（表1約置於此）

在自變項方面，包含性別（男性=0，女性=1）、世代、族群身份、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等，均以類別變項處理。本研究將受訪者區分成以下四個世代：1945年以前出生的為戰前世代，1946-1965年間出生的歸為戰後嬰兒潮世代，1966-1987年間出生的劃為轉型期世代，1988年以後出生的則歸為轉型後世代。

族群身份依受訪者的父親族群身份來認定，分成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原住民以及外省人。政黨支持傾向則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分成「泛藍」、「泛綠」與「中間選民」三類，其中「泛藍」包含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包含民進黨、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及基進黨等，「中間選民」則包括「都不支持」、「都支持」、「選人（或政策）不選黨」、以及台灣民眾黨。國族認同則包含「台灣人」、「中國人」以及「兩者都是」（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三類。

此外，模型中加入了婚姻狀態、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等常用的社會人口指標作為控制變項。在控制這些變項之後，比較容易確認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婚姻狀態以二元變項處理，其中未婚=0、已婚=1。教育程度分成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以上三類；個人收入以每月平均收入表示，由0（沒有收入）到新台幣20萬以上，分成14個等級區間，以連續變項處理。

## 四、分析方法、結果與研究發現

本研究先針對依變項的調查結果做描述統計，並與各自變項之間做交叉分析；其次再針對相關的自變項，進行二元對數迴歸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在二元對數迴歸分析中，依變項（Y）與自變項（X）之間的關係可用下面的數學式表示：

$$\ln\left(\frac{p(Y=1|X)}{1-p(Y=1|X)}\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n X_n$$

其中 $p$ 為依變項Y在自變項X之條件下對應值等於1的機率，而 $\frac{p}{1-p}$ 則為出現Y=1之勝算（odds）。自變項 $X_1$ 的迴歸係數 $\beta_1$ ，代表 $X_1$ 變動一單位對 $\ln\left(\frac{p(Y=1|X)}{1-p(Y=1|X)}\right)$ 的影響；取 $\beta_1$ 的自然指數 $e^{\beta_1}$ ，則可算出 $X_1$ 變動一單位之後與之前出現Y=1的勝算比（odds ratio）。

為了方便呈現並簡化表格，本文將各個依變項的描述統計及交叉分析綜合整理在表2與表3，二元對數迴歸分析則彙整於表4。以下分別討論各變項的分析結果。

（表2至表4約置於此）

（1）是否了解轉型正義？

根據表2，了解轉型正義的民眾僅佔不到四分之一（24.8%），不了解的將近有四分之三（74.4%）。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是否了解轉型正義，不同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政黨傾向與個人收入之間呈現出顯著差異。透過表4的二元對數迴歸分析可發現，女性（相對於男性）、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相對於戰前世代）、高中職與國中及以下（相對於大專及以上）、中間選民與泛藍（相對於泛綠），比較有可能不了解轉型正義。具體來說，女性「了解轉型正義」比起「不了解轉型正義」的勝算，僅為男性的0.521倍，而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的勝算，則分別為戰前世代的0.346倍與0.402倍，換言之勝算不到一半，差距不可謂不大。中間選民與泛藍支持者的勝算，則分別為泛綠支持者的0.399倍與0.543倍。唯一顯著的正相關是個人月均收入，顯示社經地位越高，越有可能理解轉型正義是什麼。族群身份與國族認同，並不影響是否理解轉型正義。

### (2) 轉型正義是否對和解有幫助？

從表2可看出，在提示了轉型正義的內容後，同意轉型正義對和解有幫助者佔了43.3%，不同意的則佔52.5%。如果結合上一題來看，可以說大部分的民眾並不理解轉型正義是什麼，即使經過解釋，也有超過半數的民眾不認為轉型正義對促進社會和解有幫助。

交叉分析顯示，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族群身份、政黨傾向、國族認同及個人收入，與「轉型正義對促進和解的幫助」具有顯著關係。表4的二元對數迴歸分析則指出，女性（相對於男性）、已婚（相對於未婚）、中間選民與泛藍（相對於泛綠）、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較可能不同意「轉型正義有助於社會和解」的說法。另一方面，國中及以下學歷（相對於大專及以上），較可能同意「轉型正義有助於社會和解」的說法。從具體的勝算比來看，女性回答「同意」比起「不同意」的勝算，是男性的0.619倍，中間選民與泛藍的勝算分別是泛綠的0.231與0.280倍，而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勝算分別是於台灣人認同0.345與0.213倍。

### (3) 是否同意「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根據表2，回答「同意」的佔了48%，略多於「不同意」的47.8%。交叉分析顯示，性別、世代、教育程度、族群身份、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個人收入，與本題的回答有顯著關係。表4的分析則發現，婚姻、世代、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有顯著影響。整體來說，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相對於戰前世

代)、已婚(相對於未婚)、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更有可能同意「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這樣的說法。相反地,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相對於大專及以上),較可能不同意「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從勝算比來看,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回答「同意」比起「不同意」的勝算,分別是戰前世代的2.869倍與2.701倍,已婚者的勝算則是未婚者的1.64倍,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的勝算分別是泛綠支持者的9.748倍與4.434倍,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的勝算分別是台灣人認同者的6.436倍與2.904倍;從勝算比的數值可以看出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的強烈影響。

#### (4) 是否支持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工作?

根據表3,回答「支持」的民眾佔56.3%,「不支持」的則佔了38.6%。交叉分析顯示,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族群身份、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個人收入,對這一題的回答均呈現顯著差異。從表4的分析來看,則僅有性別、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具有顯著影響。女性(相對於男性)、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比較有可能不支持轉型正義。從勝算比來看,女性回答「支持轉型正義」比上「不支持轉型正義」的勝算,是男性的0.596倍。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支持轉型正義的勝算,則分別是泛綠支持者的0.131倍與0.180倍,而雙重認同者的勝算則是台灣人認同者的0.327倍,同樣可看出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對於是否支持轉型正義具有顯著而強烈的影響。

#### (5) 是否贊同移除蔣公銅像?

根據表3,贊同移除蔣公銅像的僅佔26.6%,約四分之一強,而不贊同的佔了70.1%;顯示儘管促轉會將「移除蔣公銅像」當成「去除威權象徵」的主要工作之一,但社會對此顯然並無共識,甚至超過七成的主流民意是持反對意見的。

交叉分析顯示,不同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個人收入的回答呈現顯著差異。表4的分析則發現,僅有世代、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具有顯著影響。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相對於戰前世代)、中間選民與泛藍(相對於泛綠)、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相對於台灣人認同),比較不可能贊同「盡量移除蔣公銅像」。從勝算比來看,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贊成盡量移除蔣公銅像」比起「不贊成」的勝算,分別是戰前世代的0.358倍

與0.129倍；中間選民與泛藍的勝算分別是泛綠的0.308倍與0.181倍；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者的勝算則分別是台灣人認同者的0.306倍與0.055倍，顯示世代、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對這個問題具有顯著且強烈的影響。

#### (6) 政治監控檔案是否應該公開？

根據表3，「傾向公開」的佔了36.3%，「傾向不公開」的則佔了59.8%。交叉分析顯示，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在這一題的回答呈現出顯著差異；不過僅有性別、世代與國族認同在迴歸模型中具有顯著影響（表4）。女性（相對於男性）、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相對於戰前世代）、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較可能傾向「不公開」。從勝算比來看，女性「傾向於公開」比起「傾向於不公開」的勝算，是男性勝算的0.576倍、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的勝算，分別是戰前世代的0.413倍與0.284倍，而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的勝算，則分別是台灣人認同者的0.275倍與0.608倍。

#### (7) 是否願意參加公民會議？

從表3來看，回答「願意」的佔了50.5%，「不願意」的則佔48.3%。交叉分析顯示，教育程度、政黨傾向、國族認同與個人收入，在本題的回答上呈現出顯著差異。在二元對數迴歸分析方面（表4），則僅有個人收入、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三者有顯著影響。個人收入越高，越有可能願意參加公民會議。反之，中間選民與泛藍（相對於泛綠）、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更不可能願意參加公民會議。從勝算比來看，中間選民與泛藍支持者願意參加公民會議比起不願意的勝算，分別是泛綠的0.417倍與0.637倍，而雙重認同者的勝算則是台灣人認同者的0.682倍。

## 五、討論與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下面幾個小結：

第一，在「理解」面向上，大部分的民眾（超過七成）並不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相對地，了解轉型正義的民眾不到四分之一。影響人們理解轉型正義的因素，包含性別、世代、收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必須留意的是，由於本研究對「理解」的測量是採用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方式，因此較有自信的

受訪者（男性、高社經地位、高教育程度者），亦較可能自認為「理解」。這些將在下面討論自變項的影響時進一步討論。

第二，在「支持」面向上，超過五成的多數民眾支持政府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不支持的也有將近四成。影響人們支持轉型正義的因素，包括性別、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

第三，在「評價」面向上，可以從兩個子題來理解：（1）在「一般性評價」方面，多數的民眾並不認為轉型正義達到其所宣稱的「促進社會和解」的目的，而（2）在「政治性評價」方面，認為轉型正義只是在打擊國民黨、並沒有促進和解的民眾，也佔了將近一半，略高於不同意的比例。將兩個子題結合在一起來看，影響人們對轉型正義評價的因素，包括性別、世代、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政黨傾向、國族認同等。

第四，在「特定議題」的面向上，同樣也可以從兩個不同類型的問題來理解。有關「移除蔣公銅像」的問題，超過七成的民眾並不贊成，僅有四分之一多一點的人贊成。換句話說，多數民意並不贊成當前促轉會的做法。影響民眾態度的因素包括世代、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在「開放政治監控檔案」的問題上，將近六成的民眾傾向於「全部不公開」或「原則不公開」，而贊成「全部公開」或「有條件公開」的則佔三成六左右。顯著的影響因素包括性別、世代與國族認同；政黨傾向則沒有顯著影響。

第五，在「參與意願」方面，大約五成的民眾願意參與公民審議會議來影響轉型正義，但也有將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影響人們參與意願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政黨傾向、國族認同、以及個人收入。

從表4來看，在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上，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是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分別在本研究的七個問題中，對六個問題有顯著影響。政黨傾向在「理解」、「評價」、「支持」、「特定議題」與「參與意願」這五個面向都有顯著影響，而國族認同則除了「理解」之外，在其他四個面向上都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在政黨傾向方面，泛藍支持者與中間選民（相對於泛綠支持者）比較有可能不了解或不支持轉型正義、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對促進和解沒有幫助、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也不願意參與公民會議。在國族認同方面，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認同者）較可能有以下傾向：不支持轉型正義、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對促進和解沒有幫助、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不贊成開放政治監控檔案、也不願意參與公民會議。這個發現並

不令人意外，也符合一般的想像與期待，但如果結合族群因素來看，則可以做進一步的推論。此點將在下一節綜合討論。

在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之後，次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性別與世代，分別在七個題目中，對其中的四個題目的回答產生顯著影響。性別的影響呈現在「理解」、「評價」、「支持」與「特定議題」方面，女性相對於男性，更有可能不了解或不支持轉型正義、不認為轉型正義對和解有幫助、也不贊成開放政治監控檔案。在「理解」方面，女性相對於男性，可能比較不了解轉型正義，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是採取「自我認定」的方式來測量對於轉型正義的了解程度。過去有關政治知識的調查，女性往往自認為自己不了解相關知識，但如果用實際的具體問題來測量，性別的差異未必顯著。<sup>10</sup> 在「評價」、「支持」與「特定議題」方面，過去曾有研究指出，女性比較不偏好一般性的報復慾望，因此對於某些轉型正義的議題或手段傾向於較為保留的態度(David and Choi 2009)，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解釋本研究的發現。

世代的關聯性也頗為引人矚目，主要呈現在「理解」、「評價」及「特定議題」三個面向，但其影響的方向卻與根據常識所產生的預期相反，這也是本研究的重大發現之一。由於年輕世代常被形容為「天然獨」、接受所謂的「去中國化」的教育，因此可能比較支持轉型正義；許多起破壞蔣介石銅像或慈湖陵寢的事件，也都是年輕人所為，讓人覺得年輕世代對於轉型正義可能比較關心，甚至會採取較為激進的立場。然而，本研究發現，世代間對於「是否支持轉型正義」、「轉型正義對和解是否有幫助」、「是否願意參加公民會議」這些問題的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換言之，年輕世代比起較為年長的世代，並沒有比較支持（或不支持）轉型正義，也沒有顯著地表現出更積極參與的傾向。另一方面，相對於戰前世代來說，較為年輕的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比較有可能不了解轉型正義、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也不贊成開放政治監控檔案。同樣地，對於轉型正義的效果評估上，轉型期世代與轉型後世代也比較有可能認為「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並未促進和解」。這些態度與看法，迥異於一般對年輕世代的期待或想像。由於轉型正義牽涉到「如何處理過去、如何面對未來」的問題，這個饒富意味的發現有何理論或現實上的意涵，值得未來的研究進一步考察，本文在最後一節也將嘗試提出一種可能的解讀方

---

<sup>10</sup>感謝審查人提點此一可能性。不過，由於本研究並未使用具體的問題來測量關於轉型正義的知識，因此無法檢證這樣的性別差異是否會因為不同的測量方式而有所不同。



式。至於嬰兒潮世代與戰前世代之間，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與看法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在控制變項方面，本研究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相對於大專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比較有可能不了解轉型正義、不同意轉型正義僅是政黨鬥爭、同時認為轉型正義對促進和解有幫助。如果參照國外案例（例如西班牙）來看，教育程度較高者較不支持轉型正義的措施（Aguilar, Balcells and Cebolla-Boado 2011; Barceló 2017），本研究的發現似乎也呼應此一說法（因為教育程度較高者比較可能不同意轉型正義對促進和解有幫助，也比較可能認為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此外，相對於大專及以上的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者也比較有可能不了解轉型正義。這個發現並不令人意外，畢竟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掌握較多資訊，比較有可能理解轉型正義。再者，由於問卷中是採取自我認定的方式來詢問受訪者對轉型正義的理解程度，教育程度較高者也可能表現出較高的自信回答「理解」。

收入和婚姻狀態，分別對七題中的兩題產生顯著影響；婚姻的影響主要在於「評價」，而收入的影響則在於「理解」與「參與意願」。如果以個人收入來作為社經地位的指標，那麼社經地位較高者，比較有可能理解轉型正義、也比較願意參加公民會議。至於婚姻狀態的影響，主要呈現在對於轉型正義的評價上面。已婚者比起未婚者，更有可能認為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對促進和解沒有幫助。這是個耐人尋味的有趣發現。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婚姻對於提高人們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或增強政治意識，具有正面的作用（黃秀端、趙湘瓊 1996；林瓊珠、徐永明、黃秀端 2017）；不過，為何已婚者更有可能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對促進和解沒有幫助，目前仍缺乏相關文獻，有待未來的研究探討。

從表4當中也可以發現，在所有的自變項與控制變項中，唯一不具顯著影響的是族群身份。換句話說，族群身份對於轉型正義的理解、評價、支持、特定議題與參與意願，都沒有顯著影響。這也是一個相當違反常識的發現。過去許多批評者常指責轉型正義是在挑起族群對立，即使倡議者也不免認為不同族群之間分歧的歷史記憶是轉型正義需要克服的障礙（吳乃德 2006），但本研究發現，族群身份在上述幾個面向上都沒有顯著差異。如何解讀這個發現，本文將在下一節中，結合其他因素做綜合討論。

## 六、結語：「違反常識」的發現與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在分別討論完各個自變項的影響之後，本文最後將嘗試提出幾點綜合性的分析，做為暫時的結論。大體上來說，所謂的「轉型正義」，最初的用意是希望鞏固民主體制、提倡民主價值，讓民主的運作更為順暢，不再重複過去（威權政體）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個用意基本上是良善的，筆者無意加以否定。然而，從這次的調查與分析結果來看，當前政府所推動的轉型正義是否能夠達到原先設定的目標，恐怕讓人不由得產生憂慮。尤其本研究有不少違反常識、或是與一般預期不同的發現，這暗示著很多關於「轉型正義」的預設或是常識性的理解，恐怕是有問題的，需要被重新檢視。如何解讀這些「違反常識」的發現，很值得未來的研究繼續探討。由於轉型正義在當前的台灣是一個敏感而具有爭議的問題，在解讀這些結果的時候需要格外小心，同時必須與各種政治立場保持適度的批判距離，避免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穿鑿附會。本文雖屬初探性質，但為了激發更多的反思與討論，筆者抱著拋磚引玉的心情，嘗試在本文最後提出幾點有別於主流觀點的另類思考與疑問，希望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首先，最值得提出來特別強調的是，族群身份在所有的五個面向（七個問題）上完全不具任何顯著影響，這可以說是本研究最具有啟示性的發現。換言之，不同族群之間對轉型正義的看法，無論是在理解、評價、支持、特定議題與參與意願各方面，都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過去認為轉型正義會挑起族群對立的說法，並未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如果結合上面關於「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的討論來看，這個發現印證了汪宏倫（2021）所指出的，影響轉型正義的關鍵因素並非族群、而是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更具體來說，轉型正義的主要分歧不在於不同族群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而在於不同的國族認同與政黨支持者，依據不同的「記憶典範」（memory paradigms）對過去的歷史有不同的詮釋與評價。根據汪宏倫的分析，台灣社會當前存在著「藍色」與「綠色」兩種記憶典範，前者以中國為中心來塑造集體記憶，後者則以台灣為中心來塑造集體記憶。這兩種記憶典範分別被藍、綠兩種政治力量動員，不但高度政治化，而且兩者之間不可共量、也難以共存。藍綠兩種記憶典範形成了兩套無法相容的國族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使得國外所倡議的「轉型正義」模式在台灣難以推動、甚至無法適用<sup>11</sup>。本研究的實證資料印證了這個分析。我

<sup>11</sup> 在絕大多數的轉型正義案例中，國族的後設敘事是不會更動的，頂多只是做了一些「小敘事」的調整；相較之下，台灣的轉型正義卻是以一套新的國族敘事（綠色典範）來取代舊的國族敘事（藍色典範）——尤有甚者，台灣要重建國族的政治轉化其實並未完成，這是台灣轉型正義最根本的問題。詳細的分析參見汪宏倫（2021）。

們也可以由此推斷，台灣社會內部需要和解的，不是什麼「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類的族群，而是不同的政黨支持者與不同的國族認同者之間無法共量、難以共存的「記憶典範」。

其次，本研究發現，有將近四分之三的民眾自認為不了解轉型正義，這意味著什麼？誠如一位審查人在其意見中所提到的：「針對第一個被解釋變項的題目，有近四分之三的超高比例民眾回答並不了解轉型正義，照理說這個在熱門議題在主流媒體上被爭論的時間已不算短，為何仍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自認為不懂，回答不了解意味著什麼，是真不了解或是意味著別的？」這應該也是很多人可能會有的疑惑，因此筆者嘗試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可能解釋。

詢問「是否了解轉型正義」這個問題，並非沒有學術與現實上的理由。和其他常見的類似詞彙相較（例如「司法正義」、「分配正義」、「居住正義」等），「轉型正義」從字面上來看並不是一個讓人容易望文生義的概念；即使社會意向調查小組在設計問卷的時候，也發現很難用言簡意賅的一句話交代清楚什麼是轉型正義。雖然小組討論之後勉強用「『轉型正義』的工作內容就是『追究過去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責任並促進社會和解』」這句話來總括，也無法完全令人滿意，因為這個陳述顯然過分簡化，甚至可能會被認為有引導作用——畢竟對一部分倡議者來說，轉型正義的工作不僅只是追究責任，也不見得一定要促進和解。

在這個背景下，詢問民眾是否理解「轉型正義」，顯得格外有意義。誠如前面所引述的審查人所說，轉型正義是個「熱門議題」，進入主流媒體的討論並不算短（雖然也不算太長），為什麼仍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自認為「不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前已指出，轉型正義其實是個頗為抽象的概念，不容易望文生義，而「轉型正義」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僅有20多年的時間。即使到了現在，國外學界轉型正義的界定，都還存在不少歧見。拿一個高度抽象、定義不甚明確的學術概念（即「轉型正義」）來當做政策法案（《促轉條例》）名稱，並成立專責機構（促轉會）來加以推行的，就筆者目前所知，除了台灣之外，只有馬爾地夫的 *Transitional Justice Act*（2020）與突尼西亞的 *Organic Law on Establishing and Organizing Transitional Justice*（2013）這兩個例子而已。在絕大多數國外案例中，都是以議題或任務來作為機構或法案的名稱。例如南非的《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及知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捷克的《除垢法》，西班牙的《歷史記憶法》，南韓的《為真實與和解的過去史整理基本法》及「為真實與和解的過去史整理委員會」

等，都不是以「轉型正義」來命名。即使突尼西亞以「轉型正義」為名制定了法案，但該法案的第一條，便開宗明義界定了「轉型正義」的意義、手段與目的，內容具體而明確<sup>12</sup>。反觀台灣，政府雖然制定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卻從來沒有對什麼是「轉型正義」做過任何界定，彷彿「轉型正義」是人盡皆知的概念，無需多做說明。但事實上，無論從學理或從實務上來說，轉型正義的界定範圍與指涉對象，並不是那麼明確<sup>13</sup>，用這樣的概念來作為政策法案及專責機構的名稱，是否恰當，其實很值得商榷。而從本研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發現，其實大多數的民眾並不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有超過七成以上的民眾不了解轉型正義，那麼又有超過五成的人支持轉型正義，這該如何理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問卷中的提問順序是先問「理解」、其次是問「評價」，最後才是問「支持」<sup>14</sup>。在「評價」的問題中，如果受訪者表示不理解轉型正義，便由訪員提示「『轉型正義』的工作內容就是『追究過去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責任並促進社會和解』」。這個提示或多或少帶有引導作用，讓人覺得轉型正義是一件目標可欲、值得支持的事情。比較有趣的是，在被問到對於實際上正在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的評價時，大部分的民眾不認為「到目前為止，台灣在轉型正義的處理上對和解有幫助」，也認為「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並未促進和解」。換句話說，民眾可能認可轉型正義的目標（「追究過去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責任並促進社會和解」），但認為實際上所推動的工作並沒有達到這個目標。這除了反映出某種「理念」與「實務」的落差之外，同時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對社會大眾來說，轉型正義究竟意味著什麼？背後代表什麼樣的價值？轉型正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從政府以及倡議者的立場來看，轉型正義是為了建立民主文化、鞏固自由民主體制的運作，背後代表的是民主與進步的價值；如果不推動轉型正義，新的民主體制很難在尚待厚植的民主文化中健全運作。然而，從這次的研究結果來看，社會大眾是否也同意這樣的預設，似乎不無疑問。由於這次的社會意向

---

<sup>12</sup> 突尼西亞的法案長達15頁，分成八小節，一共70條，內容遠比台灣的《促轉條例》詳盡具體得多。參見：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TN/TransitionalJusticeTunisia.pdf>，2022/5/16取用。

<sup>13</sup> 相關討論參見Boraine（2006），Arthur（2009），汪宏倫（2021）等。

<sup>14</sup> 本次社會意向調查的問卷內容與題序，可參見：  
<https://www2.ios.sinica.edu.tw/si/data/si2020b.pdf>。

調查並沒有直接詢問與民主價值相關的問題，對於轉型正義的評價所問的問題是「對和解有沒有幫助」而不是「對民主體制的運作有沒有幫助」，因此無法做直接的推論。然而，從一些「違反常識」的發現中，或許可以做一些間接的推論。以本研究所發現的「世代」影響來說，若參照過去的既有研究來看，林宗弘（2015，2017）的研究指出，年輕世代——包含出生於1961-1975年之間的「民主轉型與學運衝擊世代」（或稱「民主轉型與野百合世代」），以及1976年後出生的「政黨輪替或網路傳播世代」（或稱「新世紀網絡或太陽花世代」）——比起其他世代有較強的民主價值<sup>15</sup>。這兩個世代與本研究的所劃分的「轉型期世代」（1966-1987）及「轉型後世代」（1988以後出生）有相當程度的重合。假使這兩個世代有著較高的民主價值，但卻比較有可能不了解轉型正義、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也認為當前政府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這意味著當前以「轉型正義」為名而推動的某些措施及其理念，未必得到具有較強民主信念或支持民主價值者的理解與贊同。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所推動的轉型正義與「民主價值」或「鞏固民主」之間的關聯性，恐怕不是理所當然。換句話說，某些人可能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打擊國民黨、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但我們不能因此推定這樣的人是缺乏民主價值、或是支持/懷念威權體制的。我們甚至可以從相反的方向推測，也許某些人正是因為支持民主價值，所以認為當前民進黨政府的轉型正義措施只是為了打擊政治對手、對民主文化的健全發展與民主體制的正常運作無正面幫助；類似地，有些人可能同樣基於民主價值，認為不應該輕言全面移除蔣公銅像，理由可能是因為這樣做缺乏民主程序、不尊重某些群體的歷史記憶、不包容多元差異，甚至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並不把蔣公銅像等同於「反民主的威權象徵」。我們可以設想，年長的世代因為曾經活過威權統治的時代，對蔣介石有一定的評價，但對於轉型後出生的世代來說，蔣公銅像是他們出生時就已經存在的東西，他們不曾經歷威權統治，對蔣介石不見得那麼反感，所以不一定認為非要移除銅像不可。這些情形都有可能，都需要更細緻的分析與探討，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再次回到「共識」這個問題上面來。對有些倡議者來說，轉型正義不一定需要有共識。很多進步價值與政治理想，並不是先獲得社會共識之後才能推動，而是在政治菁英或運動者的努力倡議之後，才逐漸為大眾所接受。政府的政策，也不一定每一項都要獲得全民共識才能推動。然而，這樣的邏輯，恐怕很難適用在轉型正義上。首先，轉型正義牽涉到的是以「正義」之名，進行整個政治共同體的道德重建工作，如果缺乏足夠的共識，恐怕損及共同體的道

<sup>15</sup> 在林宗弘的兩篇研究中，前者（民主轉型與野百合世代）的民主價值都強於後者（新世紀網絡或太陽花世代），而後者的某些年齡層的民主價值較不顯著，而且明顯較不支持民進黨。

德基礎。過去的案例也發現，缺乏共識而推動轉型正義，可能導致災難性的非預期後果<sup>16</sup>。其次，轉型正義既然強調民主價值、意圖鞏固民主基礎，那麼在推動過程中，是不是更需要民主程序與民意基礎？如果在缺乏足夠的民意基礎與適當的民主程序的狀況下，推動轉型正義，是否真的有助於鞏固民主體制、建立民主價值？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討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社會意向調查進行預試時，發現不少受訪者被問到與轉型正義有關的題目時，反應相當激烈，表示不想回答這類問題，有些受訪者甚至情緒激動，當場掛掉電話，導致問到一半的問卷無法完成。由於這樣的情形太頻繁出現、影響問卷完成率，以致於預試階段完成之後，訪員集體向督導提出反映，希望撤除轉型正義的相關題組，以免影響到正式問卷調查的進行。類似的情事，在歷年的社會意向調查中，可說相當罕見<sup>17</sup>。這個情形反映出，轉型正義在這個社會中可能相當缺乏共識，甚至在某些特定群體或個人中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sup>18</sup>。本研究的發現，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缺乏共識」這個事實。

簡要地說，本研究所發現的「缺乏共識」，主要呈現在下面幾個方面：第一，對「轉型正義是什麼」這件事情缺乏共識（因為超過七成的人表示不了解，既然不了解，就不可能有共識）。第二，對於「政府是否應該推動轉型正義」這件事情缺乏足夠共識（支持與反對的比例大約六比四）。當然，也許有人認為，只要超過五成就算是有「共識」，這是仁智各見、可以辯論的；然而，以轉型正義這個攸關整個政治共同體未來的道德工程來說，不到六成的支持率，其「共識程度」並不高。第三，在具體的「特定議題」的方面，台灣社會對於「移除蔣公銅像」這件事沒有共識，因為贊成的比例不到三成——而前文已經提到，「不贊成移除蔣公銅像」不見得代表支持威權或缺乏民主價值，

---

<sup>16</sup> 參見註腳2。台灣的轉型正義如何傷害這個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參見汪宏倫（2021）。

<sup>17</sup> 社會意向調查小組根據預試時所發生的狀況，針對問卷內容、題次與題數做了相應的調整。正式調查結束後，筆者曾親自與所有訪員進行座談，訪員們反映在「轉型正義」題組遭到掛電話的案例合計僅約11例左右，樣本存在選擇性偏誤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

<sup>18</sup> 轉型正義的題目為什麼會激起較多情緒性的反應，可能有許多不同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受訪者強烈不贊同執政黨所推動的轉型正義措施，心中蓄積許多不滿情緒，所以藉著這個機會宣洩出來。另一方面，民眾的情緒性反應也可能是因為轉型正義所牽涉到的議題，引發了人們負面的記憶或聯想。這兩種情緒，在這次調查中都可以觀察到。根據訪員座談記錄，受訪者的情緒反應以「恐懼」與「憤怒」兩者居多。「恐懼」的情緒以年長者為主，有些表示「害怕回答與政治相關的題目」、「害怕白色恐怖」甚至「害怕被抓走」。這些反應顯示，對於一部分曾經活過那段歷史的人來說，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的陰影，並沒有完全從心裡消失。會產生這些反應，則是因為預試的問卷中原本有白色恐怖的相關題目，後來因為反應不佳，在正式施測時已經刪除。「憤怒」的情緒則主要表現在對轉型正義相關問題的反感，例如「不要問我轉型正義的問題」、「不應該打壓國民黨」等。

因為民主價值最強的兩個年輕世代，比起年長世代顯著地不贊成移除銅像。第四，缺乏共識的另一個意涵，指的是「缺乏超越黨派的共識」。本研究發現，除了「政治檔案是否應該公開」這一題之外，其他所有題目，「政黨傾向」的影響都是十分顯著的。換句話說，藍綠政黨及其支持者之間，在轉型正義的五個面向上都具有顯著分歧，缺乏共識。這對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具有重大意涵。轉型正義的目標是要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政黨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機制。如果政黨（及其支持者）對於轉型正義這件事情無法取得共識，甚至拿它作為彼此鬥爭的工具，那麼推動轉型正義對於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或是健全民主體制的運作是否有正面幫助，是值得存疑的。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論，由於影響轉型正義的兩大關鍵因素在於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在台灣當前藍綠兩黨惡鬥、國族認同處於分裂的狀態之下，轉型正義想要取得跨越黨派、超越認同的社會共識，可以想見是個極為困難的任務。在此狀況下，以目前的方式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會不會讓台灣社會內部更加對立、距離和解的目標越來越遠？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誠如汪宏倫（2021）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正義」其實涉及的是一個範圍更廣闊、影響更深遠的「如何處理過去、如何面對未來」的根本問題，用「轉型正義」一詞來涵括未必適切，而各國所面臨的「轉型正義」各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與獨特性，國外的轉型正義模式未必適用在台灣。更重要的是，由於獨特的歷史脈絡及特殊的地緣政治處境，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政治轉化」（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其實並未完成，以目前的方式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對於促進和解、凝聚共識、鞏固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民主未來是否有正面幫助，是一個值得思考、也需要實證檢驗的重大課題。本研究的發現，值得所有關心轉型正義與台灣前途者三思。

## 參考書目

- 王甫昌，2001，〈國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145-208。
- \_\_\_\_\_，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市：群學出版。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真促會）編，2015，《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全三冊）》。新北：衛城。
- 江宜樺，2001，〈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頁 181-215，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
- \_\_\_\_\_，2007，〈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思想》5：65-81。
- 自由時報，2021a，〈中正紀念堂轉型 台灣社：須去除威權崇拜〉。第 6 版，9 月 10 日。
- \_\_\_\_\_，2021b，〈中正紀念堂轉型 蔣萬安：勿製造社會對立〉。第 6 版，9 月 10 日。
-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1-34。
- \_\_\_\_\_，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8：39-70。
- 吳俊宏，2020，《綠島歸來文集》。台北：人間。
- 吳豪人，2019，《「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台北市：春山出版。
- 李怡俐，2016，《當代轉型正義的制度與規範脈絡：兼論南韓與臺灣的經驗比較》。台北市：元照。
- 汪宏倫，2021，〈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思想》42：1-61。
- 周婉窈，2019，《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
- 林佳龍，2001，〈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形成〉。頁 217-266，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
- 林宗弘，2015，〈再探台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395-436。
- \_\_\_\_\_，2017，〈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認同，1995-2015〉。《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9：27-65。



- 林傳凱，2015，〈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討〉。頁 79-116，收錄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新北：衛城。
- 林瓊珠、徐永明、黃秀端，2017，〈政治知識的性別差異：測量內容之探討〉。《選舉研究》24(2)：39-63。
- 徐永明，2008a，〈追求台灣政治的轉型正義〉。頁1-8，收錄於徐永明編，《轉型，要不要正義？——新興民主國家與台灣的經驗對話》。台北市：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 \_\_\_\_\_編，2008b，《轉型，要不要正義？：新興民主國家與台灣的經驗對話》。台北市：台灣智庫。
- 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論文集》。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 張茂桂編，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許雪姬編，2014，《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記錄（全三冊）》。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 陳宜中，2007，〈吳乃德沒說清楚的問題〉。中國時報，第 15 版，2 月 25 日。
- 陳芳明，2007，〈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思想》5：83-94。
- 陳翠蓮，2008，〈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16：179-222。
- 黃秀端、趙湘瓊，1996，〈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一年〉。《問題與研究》35(10)：71-95。
- 葉 浩，2017，〈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日的主旋律—關於台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二十一世紀》159：24-38。
- 葉虹靈，2016，〈展望轉型正義時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7：42-48。
- 廖元豪，2017，〈民主憲政2.0，抑或改朝換代算舊帳？——轉型正義概念的反思〉。《台灣法學雜誌》314：124-144。
- Aguilar, Paloma, Laia Balcells, and Héctor Cebolla-Boado, 2011,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10):1397-430.
- Aiken, N.T., 2013, *Identity,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Overcoming Intractability in Divided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Arthur, Paige, 2009, "How transitions reshaped human right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1:321-367.

- Barceló, Joan, 2017, "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Attitudes toward Transitional Justice." *Political Studies* 66(2):480-502.
- Boraine, Alexander L., 2006, "Transitional justice: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0(1):17-27.
- Buckley-Zistel, Susanne and Ruth Stanley, eds., 2012, *Gender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ang-Liao, Nien-Chung, and Yu-Jie Chen, 2019,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8(3):619-43.
- David, Roman, and Susanne Choi, 2009, "Getting Even or Getting Equal? Retributive Desire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Political Psychology* 30(2):161-92.
- Hamad, Mahmoud, 2020, "A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Revolutionary Libya." *AlMuntaqa* 3(1):23-37.
- Kostovicova, Denisa, and Aude Bicquelet, 2018, "Norm Contest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Evidence from a Regional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 in the Balkans." *Ethnic & Racial Studies* 41(4):681-700.
- Maršavelski, Aleksandar, and John Braithwaite, 2020, "Transitional Justice Cascades."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3(2):207-60.
- Rigby, Andrew, 2001,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Rigger, Shelley, 2006,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Teitel, Ruti G., 2000, *Transition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表 1 各面向所對應的問卷題目、答題選項與二元變項處理方式一覽表

面向	問卷題目	答題選項 <sup>1</sup>	二元變項處理
理解	請問您不了解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	「非常了解」、「了解」、「不了解」、「非常不了解」。	了解（包含「非常了解」）=1，不了解（包含「非常不了解」）=0。
評價一：一般性評價——轉型正義有助和解	有人認為，到目前為止，台灣在轉型正義的處理上對社會的和解有幫助。請問您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受訪者表示不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則由訪員提示：「『轉型正義』的工作內容就是『追究過去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責任並促進社會和解』。」 <sup>2</sup> ）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同意（包含「非常同意」）=1，不同意（包含「非常不同意」）=0。
評價二：政治性評價——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有人認為，現在政府處理轉型正義只是為了打擊國民黨，但並沒有促進和解。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同上	同上
支持	請問您支不支持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	「非常支持」、「支持」、「不支持」、「非常不支持」。	支持（包含「非常支持」）=1，不支持（包含「非常不支持」）=0。
特定議題一：蔣公銅像	現在台灣的公共場所還有很多蔣公銅像，有人認為應該盡量移除。請問您同不同意？	同評價一	同評價一
特定議題二：政治監控檔案	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曾經監控異議份子並且留下紀錄。請問您認為這些紀錄現在應該怎麼處理？	「全部公開」、「看情況，有些公開、有些不公開」、「原則上不應該公開，只能提供給紀錄有關的當事人看」、以及「全部都不公開」。	前面兩個答項合併為「傾向公開」，對應值為 1，後面兩個答項合併為「傾向不公開」，對應值為 0。
參與意願	如果有公民會議讓民眾可以針對轉型正義發表意見，提供政府參考，請問您願不願意參加這樣的公民會議？	「非常願意」、「願意」、「不願意」、「非常不願意」。	願意（包含「非常願意」）=1，不願意（包含「非常不願意」）=0。

<sup>1</sup>回答「不知道」、「沒意見」或「拒答」等均歸為「其他」。

<sup>2</sup>這個界定其實並不完全，因為轉型正義並不僅止於「追究責任」，而有些倡議者認為轉型正義不必然會達成和解、甚至不以和解為目標。這個不夠完全的界定，反映出轉型正義並非是個容易望文生義的詞彙，也很難用一兩句話完整說明。

表2 轉型正義各面向之交叉分析：理解與評價 (n=1218)

面向	理解轉型正義			一般性評價：轉型正義有助和解			政治性評價：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了解 24.8%	不了解 74.4%	其他 0.8%	同意 43.3%	不同意 52.5%	其他 4.1%	同意 48.0%	不同意 47.8%	其他 4.2%
%/卡方檢定									
性別	***			**			***		
女性	16.2%	82.8%	1.0%	40.7%	53.5%	5.8%	43.1%	51.1%	5.8%
男性	33.5%	65.8%	0.7%	45.9%	51.6%	2.5%	53.0%	44.5%	2.5%
世代	***			***			***		
轉型後世代	18.7%	81.3%	0.0%	52.4%	46.9%	0.7%	48.9%	49.3%	1.8%
轉型期世代	21.2%	77.7%	1.1%	36.8%	60.4%	2.8%	56.3%	40.9%	2.8%
嬰兒潮世代	31.9%	67.4%	0.7%	44.0%	48.6%	7.4%	39.8%	53.6%	6.6%
戰前世代	30.8%	65.4%	3.8%	44.2%	48.1%	7.7%	38.5%	51.9%	9.6%
婚姻狀態	**			***					
已婚	27.2%	71.8%	1.0%	40.8%	54.0%	5.2%	47.6%	47.4%	5.0%
未婚	18.0%	81.6%	0.3%	51.1%	47.9%	1.0%	48.9%	49.2%	1.9%
教育程度				***			***		
國中及以下	21.9%	77.0%	1.1%	54.0%	35.6%	10.4%	26.3%	67.3%	6.5%
高中職	21.8%	76.8%	1.5%	40.0%	57.1%	2.9%	53.7%	41.9%	4.4%
大專及以上	28.1%	71.6%	0.3%	40.2%	58.1%	1.7%	55.3%	42.0%	2.7%
族群身份				***			*		
客家人	31.3%	67.1%	1.8%	42.4%	55.2%	2.4%	51.5%	44.8%	3.6%
閩南人	23.6%	75.7%	0.8%	46.1%	49.0%	4.9%	45.2%	50.4%	4.4%
原住民	22.2%	77.8%	0.0%	22.2%	77.8%	0.0%	40.0%	60.0%	0.0%
外省人	25.4%	74.6%	0.0%	25.7%	73.5%	0.9%	63.4%	33.0%	3.6%
政黨傾向	***			***			***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泛藍	26.9%	72.2%	0.9%	25.6%	72.0%	2.4%	74.9%	22.3%	2.8%
中間選民	19.0%	80.5%	0.5%	31.0%	63.6%	5.4%	57.7%	37.6%	4.7%
泛綠	32.6%	66.4%	1.0%	71.4%	26.8%	1.8%	20.6%	76.7%	2.8%
國族認同				***			***		
中國人	36.4%	63.6%	0.0%	19.0%	81.0%	0.0%	81.0%	19.0%	0.0%
兩者都是	26.9%	72.9%	0.2%	24.7%	72.1%	3.2%	68.3%	28.5%	3.2%
台灣人	23.1%	75.6%	1.3%	56.9%	38.2%	4.9%	33.4%	61.7%	4.9%
ANOVA 檢定	***			***			***		
個人收入	6.04	4.76	3.78	4.88	5.31	3.89	5.38	4.84	3.98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3 轉型正義各面向之交叉分析：支持、議題和參與意願 (n=1218)

面向	政府推動轉型正義			移除蔣公銅像			政治監控檔案			參與公民會議意願		
	支持	不支持	其他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傾向公開	傾向不公開	其他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56.3%	38.6%	5.1%	26.6%	70.1%	3.2%	36.3%	59.8%	3.9%	50.5%	48.3%	1.2%
%/卡方檢定												
性別	***						***					
女性	51.9%	41.0%	7.1%	24.8%	71.8%	3.4%	31.1%	64.2%	4.7%	48.7%	49.5%	1.8%
男性	60.8%	36.2%	3.0%	28.6%	68.4%	3.0%	41.6%	55.4%	3.0%	52.4%	47.1%	0.5%
世代	***			***			***					
轉型後世代	64.5%	33.0%	2.6%	16.8%	81.8%	1.5%	28.1%	71.9%	0.0%	53.1%	46.9%	0.0%
轉型期世代	53.5%	42.6%	3.9%	24.4%	72.1%	3.5%	32.7%	64.7%	2.6%	49.6%	49.1%	1.3%
嬰兒潮世代	55.1%	37.5%	7.4%	35.1%	61.4%	3.4%	44.2%	48.6%	7.1%	49.1%	49.1%	1.7%
戰前世代	41.5%	47.2%	11.3%	26.9%	65.4%	7.7%	45.3%	45.3%	9.4%	58.5%	39.6%	1.9%
婚姻狀態	*			*			**					
已婚	54.6%	39.5%	5.9%	28.7%	68.1%	3.2%	38.3%	57.1%	4.6%	50.9%	47.6%	1.4%
未婚	61.6%	35.6%	2.9%	21.2%	76.3%	2.5%	30.8%	67.9%	1.3%	49.4%	50.3%	0.3%
教育程度	**			***			***			*		
國中及以下	57.9%	33.1%	9.0%	34.2%	60.1%	5.8%	44.8%	45.8%	9.4%	47.3%	50.9%	1.8%
高中職	52.2%	42.5%	5.3%	26.3%	71.4%	2.4%	33.0%	63.7%	3.2%	47.9%	50.0%	2.1%
大專及以上	57.9%	39.2%	2.9%	23.4%	74.3%	2.4%	34.5%	64.4%	1.2%	53.3%	46.4%	0.3%
族群身份	***											
客家人	45.5%	50.9%	3.6%	26.1%	70.9%	3.0%	33.9%	62.4%	3.6%	44.5%	54.3%	1.2%
閩南人	61.3%	33.5%	5.3%	28.0%	68.3%	3.7%	36.8%	59.4%	3.7%	51.4%	47.4%	1.2%
原住民	44.4%	55.6%	0.0%	11.1%	88.9%	0.0%	22.2%	77.8%	0.0%	77.8%	22.2%	0.0%
外省人	36.6%	57.1%	6.3%	18.4%	80.7%	0.9%	35.4%	62.8%	1.8%	50.0%	49.1%	0.9%

(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政黨傾向	***			***						***		
泛藍	31.6%	65.1%	3.3%	10.4%	89.2%	0.5%	33.2%	63.5%	3.3%	51.4%	48.1%	0.5%
中間選民	45.8%	47.1%	7.0%	18.3%	77.3%	4.4%	35.6%	60.2%	4.2%	41.3%	57.3%	1.3%
泛綠	86.2%	11.8%	2.0%	48.1%	49.6%	2.3%	39.6%	57.6%	2.8%	64.9%	34.1%	1.0%
國族認同	***			***						***		
中國人	45.5%	54.5%	0.0%	4.8%	95.2%	0.0%	27.3%	68.2%	4.5%	63.6%	36.4%	0.0%
兩者都是	35.9%	59.2%	4.9%	12.9%	84.5%	2.5%	33.2%	63.2%	3.6%	42.9%	56.0%	1.1%
台灣人	70.6%	24.4%	5.0%	36.5%	59.9%	3.6%	38.8%	57.3%	3.9%	55.5%	43.1%	1.4%
ANOVA 檢定	*			*			***			***		
個人收入	5.16	5.02	4.30	5.19	5.07	3.82	5.09	5.15	3.40	5.30	4.85	3.11

\* p < .05 , \*\* p < .01, \*\*\* p < .001

表 4 二元對數迴歸分析結果彙整表 (註)

自變項	態度/看法之面向與相對應之題目						
	理解	評價		支持	特定議題		參與意願
	了解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有助和解	轉型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支持政府推動轉型正義	同意移除蔣公銅像	支持公開政治監控檔案	願意參與公民會議
女性 (男性為對照組)	-0.652*** (0.521)	-0.480** (0.619)	-0.245 (0.783)	-0.518** (0.596)	-0.225 (0.799)	-0.551*** (0.576)	-0.125 (0.883)
世代 (戰前世代為對照組)							
轉型後世代	-0.910* (0.402)	-0.330 (0.719)	0.993* (2.701)	0.549 (1.731)	-2.045*** (0.129)	-1.259** (0.284)	-0.229 (0.795)
轉型期世代	-1.061** (0.346)	-0.600 (0.549)	1.054** (2.869)	0.179 (1.196)	-1.027* (0.358)	-0.884* (0.413)	-0.598 (0.550)
嬰兒潮世代	-0.181 (0.835)	-0.461 (0.630)	0.694 (2.002)	0.337 (1.400)	-0.315 (0.730)	-0.468 (0.626)	-0.548 (0.578)
已婚 (未婚為對照組)	0.421 (1.524)	-0.519* (0.595)	0.495* (1.640)	-0.087 (0.916)	-0.382 (0.682)	-0.028 (0.972)	0.288 (1.333)
個人收入	0.166*** (1.181)	-0.022 (0.978)	-0.010 (0.990)	0.065 (1.067)	0.057 (1.059)	-0.009 (0.991)	0.060* (1.061)
教育程度 (大專及以上為對照組)							
國中及以下	-0.676** (0.509)	1.015*** (2.761)	-1.632*** (0.195)	0.285 (1.330)	0.146 (1.158)	0.242 (1.274)	-0.203 (0.817)
高中職	-0.620** (0.538)	0.015 (1.015)	-0.200 (0.818)	-0.080 (0.923)	-0.086 (0.917)	-0.188 (0.829)	-0.165 (0.848)
族群身份 (外省人為對照組)							
客家人	0.451 (1.570)	0.135 (1.144)	0.223 (1.249)	-0.034 (0.967)	-0.101 (0.904)	-0.085 (0.918)	-0.284 (0.752)
閩南人	0.145 (1.156)	0.215 (1.240)	0.178 (1.194)	0.284 (1.328)	-0.200 (0.819)	-0.061 (0.941)	-0.120 (0.887)
原住民	0.582 (1.790)	-0.428 (0.652)	-1.393 (0.248)	0.114 (1.121)	-0.350 (0.705)	-0.405 (0.667)	1.164 (3.202)
政黨傾向 (泛綠為對照組)							
中間選民	-0.918*** (0.399)	-1.464*** (0.231)	1.489*** (4.434)	-1.713*** (0.180)	-1.179*** (0.308)	0.066 (1.068)	-0.875*** (0.417)
泛藍	-0.611* (0.543)	-1.272*** (0.280)	2.277*** (9.748)	-2.034*** (0.131)	-1.707*** (0.181)	-0.094 (0.910)	-0.451* (0.637)
國族認同 (台灣人為對照組)							
兩者都是	0.196 (1.217)	-1.064*** (0.345)	1.066*** (2.904)	-1.118*** (0.327)	-1.184*** (0.306)	-0.497** (0.608)	-0.383** (0.682)
中國人	0.538 (1.713)	-1.547* (0.213)	1.862** (6.436)	-0.290 (0.748)	-2.891* (0.055)	-1.289* (0.275)	0.332 (1.393)
Model Chi-Square	142.083***	281.714***	356.906***	303.041***	234.521***	65.183***	75.300***
Nagelkerke R <sup>2</sup>	0.178	0.307	0.375	0.334	0.280	0.079	0.088
n	1111	1079	1081	1072	1094	1090	1108

\* p &lt; .05, \*\* p &lt; .01, \*\*\* p &lt; .001

註：表中呈現數字為迴歸係數，括弧內數字為勝算比